

感

感子心

務叢談之四

梁子衡

輕鬆話平息爭辯

同一時期，在越的「同事」（指國內到越服務的人士）有袁子健、凌楚珣、黃天邁、麥思源、周維中諸先生。袁穩重、凌斯文、黃豪邁、瀟灑、周敦厚。那時，袁先生的處境欠佳，我雖不大同意他的固執保守，但常義務為他在僑社護航。有一天黨部常務委員數人為「西支」停止活動事，開會作成決議，向袁先生「請願」，我就力排衆議，否定這一議案。他們推簡編山先生向我面質，表示他們極不高興，我說了一句輕鬆話：「您們要高興，便請中央派梅蘭芳、薛覺先來演戲好了。」簡先生為一英雄人物，後被共特暗殺。我們爭辯之後，却成為親密的同志，赤膽相見的戰友。當年我在越曾經六次報請中央調回國內，中三組鄭主任彥豪先生兩次親筆來函勉留，情詞俱厲，亦難阻我內調。當我辭准返國抵臺之日，晉謁鄭主任於龍泉街公館，他問我堅辭的理由，我說：「在海外如事事由自己作主，則製造悶悶不樂，對我亦稍為諒解。」

自越返國，我即向各方面陳情，越南已腐，

崩潰可期，我政府不必存心助其抗敵，應集中精力於護僑、救僑。胡璉伯玉將軍使越時，曾多次召見，研詢越南政情、僑情，我亦掬誠相告，可惜大家迷於繁華的現實，而使越南淪陷，僑胞承受許多本可以避免的痛苦。

數度東南亞之遊，我體認泰國僑社如一大工廠，大家勤儉為生；印尼僑社如一大家庭（現在不同了），上下和睦；菲律賓僑社如一嘉年華會，多采多姿；越南僑社如一火藥庫，隨時爆炸。另外，東南亞華僑發財容易生活難；美洲華僑生活容易發財難。

美加僑社的隱憂

我現在抄一首自己認為有點靈感的小詩「自由神下的省思」：

紐約過客，
在百層的摩天樓上，
抓到亂雲，
抓到流星，
抓到月亮，
也抓到海灣上樓船燈火一片光芒。

地下車道，

唐人街，
孔子大廈不卑不亢，
多少年代？
中國人在這裡播種，
開花，
結果。
黑夜，我踏上歸程，
一捲殘夢，
兩袖清風。

何時把它帶回東方的故鄉？

橫過這都市的心臟，
它帶來了有色人種的驕傲，
也帶來了有色人種的流浪。
一個過客，
像車上胡亂的塗漆，
染上一份世紀末的荒涼。

人羣在自由神下盤旋，
懷念着林肯的名言。
羅斯福的堅忍；
也欣賞奮根的軒昂。

疲倦地牽在兒女的衣襟，

扣着一絲一絲的離情。

當我踏在洛杉磯、紐約、華盛頓、芝加哥、三藩市、西雅圖、溫哥華（第一次訪問美加的路程）土地的時候，首先使我發覺到的是，美、加的「唐人街」（CHINA TOWN）原有的中國傳統文化系統，已受到工商社會功利主義的影響，正在作急遽的變化了。

我常說：海外華僑社會為一座走馬燈，其在旋轉變化之中永不離開一軸心（中國文化），其四週旋轉的「形象」雖亂，而其軸心極穩。但今天，走馬燈的軸心已在各種的壓力下破壞了，要想維持燈中的形象永遠圍着軸心運轉，自不容易！我分析華僑社會正面臨着下面一些無可奈何的情況：

一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已在多元文化的壓力下難以發展。

一是我們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已在多元化政治思想的壓力下陷於複雜。

一是我們服務性的經濟，已在多元化經濟的壓力下失去定力。

我在旅途中發現，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在海外雖沒有「幹部」，雖沒有「羣衆」，但到處都有朋友。我第一次訪問紐約，當地僑團聯合設宴招待，筵開數十席，我聽到座上的俞總領事輕詢當時任中華會館主席的譚中平兄：「梁先生在臺北除了僑聯外還幹什麼職位，今天這麼熱鬧？」中平兄悄悄的答說：「梁先生不是大官，是我們的朋友。」經此問答，俞總領事堅持於翌日中午，請我和各僑團的負責人午餐，一共五桌，花了他大部份的應酬費。

美國華僑社會和東南亞華僑社會的「應酬方式」略有不同，美國方面「講話」多，東南亞方面「喝酒」多。

我在洛杉磯參加全僑代表的歡迎餐會，單單介紹主客名單，足足花了半個多鐘頭。例如介紹某一僑團負責人，便要介紹全部履歷，如果身兼七八職，亦必須全部朗誦，缺一不可。我問他們，可不可改此「風氣」，一位僑領鄭重的對我說，漏掉一個「頭銜」都不可，介紹不周，他們會不繳餐費。後來到了三藩市，參加僑胞餐會，我

在多次訪問美、加時，碰到幾位優秀的外交官，如當時駐紐約的總領事俞國斌先生、駐洛杉磯的總領事劉邦彥先生、駐芝加哥的總領事歐陽璜先生，他們都是才智之士。但由於他們與華僑社會有了知識上的差距，生活、工作、背景的不同，在外交、僑務的配合上，還難做到水乳交融的地步。

我在旅途中發現，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在海外雖沒有「幹部」，雖沒有「羣衆」，但到處都有朋友。我第一次訪問紐約，當地僑團聯合設宴招待，筵開數十席，我聽到座上的俞總領事輕詢當時任中華會館主席的譚中平兄：「梁先生在臺北除了僑聯外還幹什麼職位，今天這麼熱鬧？」中平兄悄悄的答說：「梁先生不是大官，是我們的朋友。」經此問答，俞總領事堅持於翌日中午，請我和各僑團的負責人午餐，一共五桌，花了他大部份的應酬費。

我在旅途中發現，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在海外雖沒有「幹部」，雖沒有「羣衆」，但到處都有朋友。我第一次訪問紐約，當地僑團聯合設宴招待，筵開數十席，我聽到座上的俞總領事輕詢當時任中華會館主席的譚中平兄：「梁先生在臺北除了僑聯外還幹什麼職位，今天這麼熱鬧？」中平兄悄悄的答說：「梁先生不是大官，是我們的朋友。」經此問答，俞總領事堅持於翌日中午，請我和各僑團的負責人午餐，一共五桌，花了他大部份的應酬費。

我在旅途中發現，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在海外雖沒有「幹部」，雖沒有「羣衆」，但到處都有朋友。我第一次訪問紐約，當地僑團聯合設宴招待，筵開數十席，我聽到座上的俞總領事輕詢當時任中華會館主席的譚中平兄：「梁先生在臺北除了僑聯外還幹什麼職位，今天這麼熱鬧？」中平兄悄悄的答說：「梁先生不是大官，是我們的朋友。」經此問答，俞總領事堅持於翌日中午，請我和各僑團的負責人午餐，一共五桌，花了他大部份的應酬費。

我在旅途中發現，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在海外雖沒有「幹部」，雖沒有「羣衆」，但到處都有朋友。我第一次訪問紐約，當地僑團聯合設宴招待，筵開數十席，我聽到座上的俞總領事輕詢當時任中華會館主席的譚中平兄：「梁先生在臺北除了僑聯外還幹什麼職位，今天這麼熱鬧？」中平兄悄悄的答說：「梁先生不是大官，是我們的朋友。」經此問答，俞總領事堅持於翌日中午，請我和各僑團的負責人午餐，一共五桌，花了他大部份的應酬費。

僑聯朋友滿天下

便先向當地僑領黃仁俊先生打招呼，建議他勸告歡迎餐會的主持人，介紹主客時，只說在僑聯方面的職銜，餘則從略。例如介紹黃仁俊先生，即說：「黃仁俊先生，現任僑聯總會常務理事，其餘職位從略。」可是，即使這樣化繁爲簡，也花上了二十分鐘。

美東和美西也略有不同，美東比較簡單。

張曉峯氣度恢弘

紐約唐人街的孔子大廈、三藩市唐人街的中國式牌樓，以及兩地的定期祭孔活動，使我萬分敬佩海外僑胞那種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苦心與耐心。他們真是像守着自己的生命一樣，在海外守着自己的文化。

我在紐約見到畢生爲宣揚中國文化而努力的楊裕芬先生，他曾任大陸時代暨南大學的秘書長和教授，現任紐約中國書法學會的理事長，八十高齡，每天從皇后區乘地下車到紐約唐人街上班，並不因眼瞎耳聾而放下爲文化耕耘的責任。民國六十九年，我訪問美、加返國後，蒙張曉峯先生召見於其龍泉街公館，他問我爲何離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的教席，隨後談到海外許多問題，我趁機問他：「張先生，假如有一位畢生爲中國文化努力耕耘的人，年屆八十，仍在海外奮鬥不懈，我們應如何給他獎勵呢？」張先生說：

法。」我說：「張先生，我想只有您有辦法，您可以贈他一個名譽學位。」張先生一下子就說：「好！好！您送一份他的簡歷來。」當時我受寵若驚，深感張先生處事之誠捷，以及器量之恢弘。

我走出張公館後，轉往隔壁的鄭公館將情形報告鄭彥棻先生（鄭先生是楊先生的好友），並於兩日後將楊先生的簡歷呈曉峯先生。大約一個多月後，便由中華學術院頒給楊先生一個名譽哲士（博士）的學位。

後來，楊先生曾專程返國向張先生致謝，當時由現任「中國文化大學」研究所長丘正歐博士和我陪同楊先生到陽明山「文大」晉見張先生。張、楊兩公對面而坐，楊先生說：「謝！謝！」

張先生說：「那裡！那裡！」就這樣對話幾分鐘，我便暗示楊先生告辭。「謝！謝！」「那裡！」那裡！」這是兩學人的精彩語錄。在我們聽慣了口沫橫飛、長篇官話的人聽來，真是有如在酷暑中吃下冰淇淋，有清涼爽快之感。

中共的文化統戰

中共遼掠大陸後，自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是以政治重建為主階段；從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是以經濟重建為主階段；從四十七年至五十四年是以社會改造為主階段；到了五十五年則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對海外華僑的統戰，隨上述各階段作不同的運用，但因為衝不破文化這一層次而節節失敗，始終無法成功。

華僑對大陸中共只有一點鄉土感情，而沒有政治感情、文化感情。中共在此一態勢下，近年

乃將其統戰陰謀推進至文化層次，以文化替代政治，企圖在華僑社會建立民族感情、文化感情。

據說中共近年曾秘密訓令：「以武力橫過臺

灣海峽解放臺灣，已不是最近之路。最佳的捷徑是香港、澳門、日本的東京，及美國的華盛頓！」

（見中國僑政學會編印，華僑問題論文集第二輯，盧鎮基先生文）中共要以文化統戰來爭取

海外華僑，要從海外來攻取臺灣。

民國七十三年，我訪問溫哥華時，有一羣曾

多次返國觀光，素稱反共的僑胞約我餐敍。他（她）們的思想在中共文化統戰之下動搖了，在餐

席上說了很多媚共的話，我對他們說：「共產黨好不好，您們自己去判斷，我不勉強您們。但有兩

項事實，我願提供您們參考。第一：中共口中有主義，但事實沒有主義，只有路線。毛澤東路線

、劉少奇路線、鄧小平路線、四人幫路線、華國鋒路線，而在香港萌動革新的意念，在美國檀香山建立革命

社會是綠葉，牡丹雖好仍須綠葉扶持，使其益加明艷。回顧我中華革命史，國父孫中山先生亦是

在中共東京聚結革命的力量，後從香港的組織，在日本東京聚結革命的力量，後從香港

、上海進攻大陸，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中共要竊用這歷史經驗攻取臺灣，我們必須

本此歷史經驗策先反攻大陸。

我經過四次訪美，在華僑社會中發覺到，今

天華僑社會在各種因素影響下而開始調整和結合

新的權力中，華僑的政治思想和立場已不單純了。

有些愛國人士整天高唱「參與」，也不是「犧牲奉獻」的「參與」，而是以名利為條件的「參與」。與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的時代，

在質量上有極大的不同。故筆者每次訪問歸來，

常本感感遊子之心，以報喜亦報憂的心情，呼籲

社會注意。時到今天，雖山居靜讀，閉門自修，但仍舊有：「身為野老已無責，路有流民終動心」

的感受，而不願放棄匹夫報國的責任。

是我們今天努力的工作方針。我特別提出張曉峯先生獎勵海外文化工作幹部這一義舉，便意在燃起一個火的行動訊號。

路有流民終動心

美、日今天已成為中共外交、僑務對我作戰的重心。中共說香港、澳門、東京、華盛頓是「解放」臺灣的捷徑，港、澳是指僑務而言；東京

、華盛頓則是着眼於外交。

以我們來說，臺灣與大陸同胞暨海外僑胞已

不可分。自大陸淪陷後，臺灣是牡丹，海外華僑

社會是綠葉，牡丹雖好仍須綠葉扶持，使其益加

明艷。回顧我中華革命史，國父孫中山先生亦是

在臺灣萌動革新的意念，在美國檀香山建立革命

社會是綠葉，牡丹雖好仍須綠葉扶持，使其益加